

继去年《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大热之后，今年，又一部印度电影《神秘巨星》登陆中国院线并引发众多关注——

它张扬女性梦想,却没有成功学的陈词滥调

宗城

一种关注

去年,《摔跤吧!爸爸》让演员阿米尔·汗进入中国观众视野;今年,作为制片人和主演,阿米尔·汗携《神秘巨星》再度来临,又一次收获了中国观众的泪水与掌声。这不是一部励志电影,它试图刺向沉重现实——这个现实的关键词是印度的性别不平等。

《神秘巨星》可谓印度版的《寻梦环游记》,故事的引子一样是梦想与家庭的冲突——一个爱唱歌的尹希娅,和一位反对她做歌手梦的父亲。但比起梦工厂的动画电影,它蕴含了更多的维度,这令讨论《神秘巨星》成为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我们能轻易解读出影片中梦想与家庭的冲突、性别差异的冲突、成人与儿童的冲突等,但又绝非泛泛而谈。影片一度让我担心它沦为了一部二元对立的复制品,但导演阿德瓦·香登妥善地处理了电影的叙事,在抛洒情怀的同时,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

它没有陷入“美国梦”式的老套情节或成功学的陈词滥调。当成功成为唯一标准,真正重要的价值就会被压制

也许《神秘巨星》预设了两种结局——一悲一喜。第一种,是女儿尹希娅有感于母亲的不易与家庭结构的难以跨越,割舍梦想,对现实妥协、与父亲和解;第二种,就是影片最后的结局,尹希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与旧结构作出决裂。我更偏爱第二种,因为温情的和解往往抹杀问题的复杂性,辜负逻辑的同时,放弃了向深刻问题进军的勇气。如果尹希娅与父亲和解,不会有任何问题好转,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且,它的逻辑是不自洽的。所以,《神秘巨星》现在的结局虽然也有问题,但总体是令人接受的。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何种路径,而是决定者从萌生念头到实现念头的过程。假设“神秘巨星”最终揭开面纱,领取属于她的金色奖杯,这依然是一部出色的商业杰作,但恐怕将沦为“美国梦”式的老套情节或成功学的陈词滥调,当成功成为唯一标准,真正重要的价值就会被压制。

所以,尹希娅在台上没有洋洋洒洒吐露自己的艰辛不易,阿德瓦·香登让她将焦点转移到母亲身上。一个属于成功者的舞台,最高光的时刻却是对一位母亲的歌颂,是对印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性别结构施予女性的痛苦的斥责。

明眼人都看得出“神秘巨星”的反抗对象是尹希娅的父亲,在影片中,这位父亲象征着印度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父亲”在此是一个功能符号,他对母亲和尹希娅冷漠无情,对儿子却疼爱有加;他自以为是,掌控着家庭的一切,种下母亲与尹希娅的不幸之源。但她们为何没有早早逃出这个男人的魔爪?因为父亲垄断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是一家人经济的支撑者。同时,突然逃离整个家庭、背弃一段婚姻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尹希娅——这个“生下来就是一个错误”的人物也许可以轻易逃离,但对母亲而言,这是一个艰难抉择。

更何况,尹希娅的母亲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生长环境与历史烙印的“绝对个人”,她的观念时时刻刻体现着历史与环境对她的影响。当尹希娅将离婚协议书递给她,她的反应不是感激涕零而是愤怒;当尹希娅声泪俱下地控诉父亲,她却维护自己的丈夫,并劝尹希娅要接受命运的安排、有限的自由。

青年人也许可以轻易地斥责母亲的愚昧,但从母亲的角度出发,考察她的成长轨迹,她的态度并非无法理解。母亲成长在一个比尹希娅更专断的父权社会,女性的出生被认为是一个错误,所以当她怀上尹希娅,她只能一个人逃往他处把尹希娅生出来,再对丈夫先斩后奏。她何尝没想过逃离,但对她而言,逃离是一件艰辛之事,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的瞬间坍塌,也牵涉到子女的抚养、舆论的谩骂乃至整个生活环境的剧变。

母亲在等一个时机,一个适合逃



在影片《神秘巨星》中,“父亲”象征印度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父亲”在此是一个功能符号,他对母亲和女儿尹希娅冷漠无情,对儿子却疼爱有加;他自以为是,掌控着家庭的一切,种下母亲与女儿的不幸之源。

导演阿德瓦·香登利用电影探讨性别不平等 问题,亦在琢磨解决之道。他没有把男女关系简化成敌对关系,也没有贩卖单纯的和解话术,而是用电影故事道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整个社会性别观念的水位,用整体的良知推动社会结构的改善。

►《神秘巨星》海报,阿米尔·汗扮演的夏克提身上 隐隐有父亲的光芒,他的形象成为海报底色,与另一版海报中女孩的背影,构成对印度女性现实处境的隐喻。



表面在说印度底层少女实现歌手梦,其实,无论是尹希娅还是母亲,她们真正的梦想是夺回女性“呼吸”的权利

但这些帮助绝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如果夏克提一接触尹希娅就帮她联系律师,那《神秘巨星》就只是一次“一厢情愿”的道德消费,但在整个故事中,尹希娅的光芒并不因她是弱者,而在于她的歌唱、她对梦想的坚持与实现。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女性崛起戏码,《神秘巨星》中,尹希娅的成功靠的并不是对男权体制的附庸。一路上,她用不是女色,不是消费身体,也不是对某一男性的逢迎,而是自己天籁的歌声。笔者并不否认钦腾、夏克提对尹希娅的帮助,但他们显然不是尹希娅改变命运的根本原因,钦腾、夏克提与尹希娅的关系,不是畸形的大量男性围绕一位女性团团转,女性的成功依赖男性对其身色的喜爱。事实上,尹希娅在学校并无多少追求者,而她与夏克提的关系更近乎朋友或者“精神意义上的父女”。在遇见夏克提之前,尹希娅生命中的父亲角色其实是缺席的,那个冷漠无情的人只是她名义上的父亲,但在内心她对他毫无感情,而在遇见夏克提并受到帮助后,尹希娅才会体会到一丝男性长者的关怀,当她拥抱夏克提的那一刻,夏克提的身上隐隐

先·见

许多年以后,“我”在深夜的陌生城市收到已经失散许久的少年时代朋友的短信。那个叫作尹小跳的女孩说:23点11分,我经过你所在的城市。这个时候,“我”站在窗前打了一个哈欠,“感到有一些液体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落下去,好像一下子回到集散之地,人们来来往往,不会驻留,它让你情不自禁,无处藏匿。我极其不满意自己这种婆婆妈妈的态度。”但是,叙述者终究没有控制住真情,可能是小声的喃喃,也可能仅仅是在内心中沉默的呐喊,忍不住嘟哝了一句:“我——想——念——你——尹小跳——”这是项静《集散地》里题名小说的结尾。

怎么样,这样的情节和语言,有没有村上春树的影迹,像不像塞林格那个霍尔顿的口头禅,会不会让你想到夏洛的网?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却又有着未经损耗的活力和想往。《集散地》最能打动人的是那种关于时间与变迁体验的篇章,因为那些注定会消逝,并且绝不会再回来的东西,其中细微的宿命感本身就有一种永恒性,总是会触发我们关于人生的种种同情与共感。那些事物是最为铭心刻骨的纯真、懵懂、浑噩又葱翠的青春和友爱——人们都会经历,偶尔交集的时刻,然后浮萍一样散开,就像人生本身。如同任何一个有过如此普遍性经验的写作者一样,项静忍不住会让它们在文字中落脚,以免在现实中失散后就灰飞烟灭。所以,在《桑园会》中我们会看到侯孝贤、朱天文般的浮云温柔和世事躲避,这倒并不是说项静受到《童年往事》或《冬冬的假期》的影响,而更多可能是自然的天机触动,因为尽管具体的时空可能会不同,成长所面临的恒久主题——变化——则是共通的。

但项静更加年轻,她的经历也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所以她的记忆便少了一些物哀的意味。项静不是那种喜欢戏剧化的文艺青年,毋宁说她给人一种温婉的书卷气,一个普通青年的表象——当然,这种表象之下也可能隐藏着惊雷与风暴,只是它们会以另外的面目出现。普通青年沉潜 in 生活的河流之中,并不会有太多飞扬起伏的狗血遭际,即便有旋涡暗礁,也会被日复一日的潮汐冲刷沉积,凝结成岸边沉淀而光滑的石头。《明亮的星》里走出了小镇的少年,即便是在青春记中也不会是青春祭,虽然有怀旧,但那怀旧也是匆匆而过,恍若大野有风,吹过丛林,树叶簌簌作响,旋即止歇,而风已走过,虽然有的人可能永远留在普集镇的夏天里,一切还有余地,一切都才刚刚开始,道路向前铺展开来。“世界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变了”,变与不变之间,是一颗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绝假纯真又倔强无匹,对于80岁的韩尚英也是一样。一路闯关,到最后返璞归真,老儿子意外身亡,她也并没有想得开或者想不开,总归就是“我管不了那些事儿”(《上高山,跳高台》)。这是一个为己的老太太,倒并不显得自私,因为那是一种经过了沧桑之后的坦荡。对于项静的小说而言,这其实构成了一个换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置换到写作中,我们可以很容易辨别那些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为己”写作的诚与真,和那些事先被外在要求束缚的“为人”写作的断裂与隔膜。这倒不是说“为人”写作不真诚,而是说在起心动念的写作原初,一定是从最初一念的切己感受开始的,而后才会有人生、社会、道德和文化诸如此类的踵事增华。

从“为己”开始,是一种天然生发,如同植物种子在特定时节应信发芽,而此后的苗实枝蔓也并没有一定的明确规划。所以《集散地》中的诸多篇什,确实如同集散地上的散碎花朵,杂沓人群。《平行线》中堂兄弟俩的不同人生,隐喻了决绝而又缓慢的乡土变迁;《世上桃园》中旋即退隐在生活中的少年莫名案件,是命运与偶然;《欢乐颂》中日常琐碎和代际差异形成的黑色幽默,不乏情感与伦理形态的转折……题材与人物取向各异,似乎都指向某个不动声色而又不容置疑的社会过程,然而它们又都是含而不露的。年轻的项静很早就获得了洞若观火而又人情练达的文字能力,她笔下的篇章自成一体,混融难分,成为一个个既各自独立又隐约关联的世界。她无法(可能任何人都无法)对那世界进行评判,但赋予了它们一种敞开性,让那些晦暗、含混、黏稠、油腻的人生与故事获得一种清晰如少年般的形式感。难解之谜没有在意因果逻辑中取得答案,但混沌因此打开,启示由此产生。

项静更多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知名,我还记得某次在浦东机场送别一起吃饭,她说到自己最心仪的还是做学术,所以她出的这个小说集确实颇让我吃惊。事实上这些小说显示出了一个与批评文字中的项静堪称截然不同的面目,它们更含混,更犹疑,因而也更丰富。《挑绷头》和《下落不明》讲的都是无因无果的片段,同学罗念莫名奇妙地出走了,随之浮现出来的只是一些难以接续的零碎回忆和想象建构;而在蒋小雅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快速度和她情但一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消失在人海之中。有意味的是,项静没有把它们结撰成浪漫主义的庸俗情节剧,而是让无疾而终本身成为一种状态,氤染成一种当代感受。这种人生无常的体验也许曾经以抽象的形式贯穿在人类社会的始终,然而此时此地,它们都锚定在当代的嘈杂、匆忙和混乱之中。项静的叙述者以一个冷静而不是温情的面目出现,它尽量隐匿主动的激情,呈现给读者一个放弃了索解欲求的人生情态。

这个人生情态是一种过程中的情态,人生还很漫长,插曲所在多有,浪花不停翻滚,河流自会向前。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仙人掌》和《在烈士陵园下车》的开头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仙人掌》的情节不过是一个俗套的同学聚会故事,但是它的开头是主人公叶诤的地铁遭遇:一个中年男人晕倒在车厢中,在他苍白的面容、凸起的腰腹和虚弱的身体上,叶诤窥见了让自己不安惶恐的可能性。这个略显惊悚的开头与接下来的繁琐日常形成了结构上的映照,让人惕厉自省而心生悲悯和谅解。而《在烈士陵园下车》中的谢嘉也是公交车上奔赴不可知的未来,“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奴隶”,意味着此后发生的或者怪异或者平常的情节都不过是曲折人生中的偶然一幕。至于琐碎的齟齬和日常的折冲是否有答案,并不是无人关心,而是无力去寻求。这也许体现了我们时代写作者的一种普遍心态,他们再无信心去在宏观中把握历史的脉象,因而回复到为己的初心和本来,在呈现中触发启示。

项静在这个小说集的创作谈中写道:“每一个地点都不会固定,人来人往,就像旅游集散地这种地方,匆匆忙忙,但谁都有漫长的影子,来处与去处,辑录了他们人生的片段,连缀成篇。而所有这些空间里,都承载着我内心感受到的个人和时间的变化,故事各自独立,看起来没有很大关联,但我知道它们一起拥挤着想要走去的方向。”其实,人们想要去的方向只有在行走中慢慢确定,就像这个小说集中的故事各自独立,每一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可能并不构成一个秩序井然、条理整饬的建筑,却将自己生长为一株根茎在地下蔓延纵横的藤蔓植物。显然,植物更具有生气,并且包孕了多样的可能性,在枯荣之后还有葳蕤,收获之后仍会再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那些放弃了索解欲求的人生情态

项静《集散地》读札

刘大先



《集散地》

项静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